

昆明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一)

出版说明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是人民政协的主要工作之一。文史资料由当代人或见证人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可以补书刊文献之不足，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承前启后，为实现国家四化建设服务，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会决定成立文史资料研究机构，对文史资料进行征集、整理、编辑、出版《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的工作。

文史资料的征集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教、卫生、科技、民族、华侨、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征集时限自戊戌运动起（这其中有许多是未经发表的遗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后截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

昆明为祖国西南边疆重镇，是云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清末以来，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云南人民抗法、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昆明辛亥重九起义，护国运动，解放前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与武装斗争，昆明的民主运动和云南和平起义等，都与全国息息相关，需要把它纪录下来。为免人事代谢，资料湮灭。我们恳切希望经历过各项历史事件的老人、革命老同志和中青年当事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爱国人士，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秉笔直书，为我们撰写史料，以便整理出版，俾补现代史料之不足。

我们编印文史资料选辑，尚属初创，缺乏经验，加之编者限于水平，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多提意见和补充订正。

政协昆明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Yt 214/01

目 录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廿一周年纪念·····	唐继虞遗稿(1)
云南起义之经过·····	黄毓成遗稿(5)
天民回顾录·····	吕志伊遗稿(9)
杜韩甫事略·····	吕志伊遗稿(12)
吕志伊事略·····	南强杂志社(16)
编者按·····	政协昆明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
朱德轶事·····	马伯周(21)
辛亥革命, 赵复祥光复临安、蒙自之经过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马伯周(45)
赵又新将军传略·····	张廷勋(52)
云南辛亥光复及护国起义琐见侧闻·····	赵竹青(63)
叶荃生平述闻·····	马伯周(69)
蔡松坡(锷)将军轶事三则·····	何开明辑录(109)
杨杰将军二三事·····	宋文熙(112)
我所知道的杨杰将军·····	王凯亭(立民)(120)
我参加西安事变的回顾·····	张治邦(雨辰)(124)
抗战初期 新闻采访拾遗·····	陈廉雅(133)
闻一多先生遇难真相·····	王之翰(147)
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侧记·····	马崇兴(156)
国民党在昆明地区导演国大代表	
立法监察委员选举纪实·····	刘镇宇(166)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青干班始末记·····	陈开国 (175)
国民党贵州集中营概略·····	滕云栋 (214)
我参加东北反人民战争的回忆·····	许义清 (222)
云南起义回忆卢汉将军·····	严中英 (239)
云南空军起义概述·····	张有谷 (258)
记云南杰出的科学家陈一得·····	李济五 (267)
欧美苹果输入云南的历史及棉蚜防治·····	杨辉远 (281)
聂耳在上海创作和学习的片断回忆·····	王浩兰 <u>王旦东</u> (286)
回忆聂耳在北平生活片断·····	王浩兰 (289)
云南国学专修馆概略·····	李东平 (292)
陈荣昌先生与云南国学专修馆·····	曹钟瑜 (297)
护国将领蔡锷、李烈钧、唐继尧遗诗	
滇川途次·····	蔡 锷 (306)
云南起义廿一周年感怀二首·····	李烈钧 (306)
庚戌正月由家赴省途中偶成·····	唐继尧 (307)
壬子冬由黔督滇途中偶成二律 (其一) ·····	唐继尧 (307)

国民党贵州集中营概略

滕云栋

国民党的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积极反共，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恶场所。它的真实名称，是战时青年训导团，（以下简称训导团），隶属行政院，因在抗日期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这个反共机构，对外不能公开，因而用“训导”之名，以掩人耳目。

训导团秘密设置在重庆郊外五云山上，西南各省市非法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多送到这里“受训”。该团经费开支庞大，由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按月拨发，还在一些省市设置有分团，其犖犖大者，为上饶集中营，即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此外，湖南芷江、沅陵等地也设有分团，规模较小。

国民党在贵州设立的集中营叫战时青年训导团贵州省收容所，它是训导团在贵阳设立的一个较分团为小的机构，其成立概况，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贵州战时青年服务大队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曾密令各省市成立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使省市党政军步调一致，严密防共活动。一九四一年一月，黔省党政军机构，即奉令成立贵州省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以下简称黔特会），下设行动、宣传、审讯三个组。审讯组专负审理被捕人员。当时黔省会报，无关

押入犯之处所。由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中统室），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贵阳黔站（以下简称军统黔站）两特务机构所捕送人员，经审讯组审问后，因无处关押，祇得送原捕机构寄押。这时审理工作极感不便，黔特会为解决此项困难，乃召开特种联席会报，出席的有：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兼黔特会代主席黄宇人（黔特会主席按中央特会规定应由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兼，吴因公忙，请黄宇人代理），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民政厅长谭克敏，教育厅长欧元怀，保安处长韩文煊，社会处长周达时，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参谋长王天鸣，贵州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严慎予，中统黔室主任管颂北，军统黔站站长李敏楨，黔省党部委员黄国楨及刘孔亮等出席会议，由黄宇人主持，为了解决当时关押人犯困难，决定由黔特会成立贵州省战时青年服务大队，经费、因粮，由贵州省政府指令财政厅、田赋粮食管理处按月拨给。服务队队址，租用贵阳富水路北段云南会馆馆址。服务队设大队长一人，副官一人，由代主席黄宇人派原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张星耀任大队长。服务队成立后，在审理中之人犯，不再寄押原捕单位。服务队对训导工作亦能重视，仿照重庆训导团的办法，每月定期请贵州省党部的委员及西南公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高润波等轮流对关在队内的人员讲课，所讲资料，采用旧三民主义及陈立夫所著《唯生论》。这些讲话对这班原来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是不起作用的，结果是徒劳无功。

服务队对送训人员不能迳送重庆训导团集中训练，因经费困难，祇能留本队受训。代主席黄宇人因见黔特会议决的送训人员，愈来愈多，乃电请重庆训导团派员来筑接送一批人去渝受训。一九四二年八月初，训导团来电，派该团大队副杨凤举来筑与黔特会洽办送渝受训人员接送事宜，待杨抵筑后，黔特会

代主席黄宇才召集会议，决定通知省中统室和军统黔站将送训人员连同档案，从速送会，报审讯组复审，经会决定后集中送渝训导团受训。当时省中统室和军统黔站送会的，计有：王恩、肖绍鑫、桂礼钦、吴庸、严岳乔等共三十人。此外，还连同原关押在服务队的十名送训人员共四十人，一并签请黔特会送训。当经议决，所有签请的四十人，交训导团派员接送重庆，各人的档案均送原送单位保管。会后即通知杨凤举接收，杨除带来卡车一辆外，并租用西南公路局卡车一辆，载往重庆。此后送渝受训人员，均系服务大队长张星耀亲自押送重庆训导团接收。

(2) 第二阶段 战时青年训导团贵州省收容所

战时青年训导团贵州省收容所是在战时青年服务大队基础上，请准扩充设立的。由于黔特会经费困难，对青年服务大队经费及送训导团受训人员之费用，均无力担负，乃以代主席黄宇才名义代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呈述黔省防制共党活动工作，正积极展开，惟逮捕人员，无址关押，审理工作，深受影响，拟请拨款将在囚人犯设所收容，以解决现实困难。几经电请，才接到何应钦联秘字代电（当时何应钦主持中央特种联席会报，对外行文系借用军事委员会名义，会报下设秘书处，何派萧毅肃兼秘书长，代电中的“联秘字”，是代表中央特种联席会报秘书处发的电文）略谓：代电悉，所呈该省会报实际困难情形，经交战时青年训导团查核办理，并由本会拨款三万元，辅助该会报经费，等语，黔特会奉电后，即拟具战时青年训导团贵州省收容所编制及经费预算各一份，其编制为：所设上校所长一人，下设总务、训导两个组，组设中校组长一人，每组设少校组员一人，上尉事务员一人，杂务士兵十人，经费预算，月为法币一万五千元，经黔特会以代主席黄宇才名

义，代电重庆训导团主任康泽，副主任徐君佩，请予核办，嗣接该团复电，同意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份起拨发收容所每月经费为一万三千五百元，该所名称及编制，均照所拟副表办理。黔特会接电后，由代主席黄宇人召集黔省特种联席会报，当经决定，将战时青年服务大队结束，成立战时青年训导团贵州省收容所，派前服务大队长张星耀为收容所上校所长，该所下设总务、训导两个组，组长及组员由该所长提名报请会报核委，至战时青年训导团按月发给该所经费，汇由会报核发，此项决议由黔特会秘书处抄录通知该所后，所长张星耀表示不满，认为收容所系训导团直属单位，黔特会祇能监督，不能对收容所的人事经费，再加控制，张采取表面服从，暗则向重庆汇报，并向训导团请求，对每月发的经费，直接汇交收容所，不必汇由黔特会转，唯恐扣发。

训导团不愿由黔特会控制收容所，因此经费两月后即停发。直接汇交收容所。虽然黔特会一再电催，训导团仍不作答，延至四月，黔特会感到垫发收容经费，已捉襟见肘，无力再垫，乃由当时黔特会代主席国民党贵州省部主任委员傅启学，召集联席会议，商讨解决，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傅启学，郑道儒，王天鸣，欧元怀，韩文焕，严慎予，袁世斌（民政厅长）戴天强（中统室主任），黄加持（军统黔站站长）等，由傅主持，当即决定：由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上校参议兼本会负责秘书滕云栋代表本会前往重庆训导团，洽请从速补发收容所四个月经费，以资维持，在会后三日，滕即衔命赴重庆，先至军事委员会内晤中央特种联席会报秘书处兼秘书长肖毅肃（肖的本职是远征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而陈黔省特种会报一年多来防共工作概况，并呈交书面报告，当由社会部派在中央联秘处工作的万钧，出函介绍我到训导团与该团副主

任徐君佩面洽，次日我即赴重庆北碚附近五云山（距重庆有七十华里），实地了解情况。

训导团设在五云山上，周围筑有城墙，内有礼堂办公室会客室，两旁建有多排房屋，即各省市送训人员住所，该团上校大队副杨凤举当时对我殷勤接待，并介绍我与该团主任秘书洽谈，据云该团主任康泽因在中央兼职多，从不到团，而副主任徐君佩，也很少到团，要我到重庆上清寺重庆村七号，他的住处找他，当晚我请杨凤举找由贵州送训的吴庸、桂礼钦谈话，得悉训导团称呼受训人员为“学生”，他们彼此之间则称同学，至于受训人数和受训情形，事关该团秘密，不便探询。次晨，我即返重庆。

我到重庆村有数次，才会到徐君佩，开始徐抱推诿态度，几经谈话，并请中央特会秘书处万钧、叶仇之等人，数次电话催促，徐才允予汇发，待我返筑后，才知该团是按核定收容所每月经费一万三千五百元，发给一个月，汇交黔特会转发，此后，则又无消息。

我返职不久，收容所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发生事端。由于所长张星耀直接与训导团联系后，遇事不愿向黔特会请示，擅自作主，甚至将在囚的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放出“远足”（到所外旅行），经过贵阳三桥时，突然发生已经判处，留在贵州收容所受训的“读新”、“自力”等三个书店的经理张自新等三人逃跑事件，经多方查缉无着，黔特会秘书处对此主张将张星耀撤职，惟贵州省三青团支部则对张袒护，而黔省中统室主任戴天强又不表态，使张继续留任。但这一事实，为重庆训导团获悉，认为张星耀办事，事前未严密考虑防范，竟发生此种不应有的事端，便企图直接接管收容所，乃将张星耀调重庆训导团工作，另派训导团秘书邱慎修接任所长。

邱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初到收容所接事后，对该所人事规章制度，一切皆受命于重庆训导团，极少向黔特会行文；更谈不上受黔特会的监督，已成为一个训导团分设的独立机构。收容所在张星耀时，还能做一点训导工作，邱慎修到职后，很少请外面的人到所内讲课，祇凭他在训导团的数年经验，有时召集受训人员讲讲话，这样一来，训导就更加有名无实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日本侵华军少数先头部队窜到贵州独山，蒋介石计划烧光贵阳，这时重庆训导团急令贵州收容所立即撤销，所有送训人员由该所长押送重庆训导团受训，对其情节轻而又身体病弱者，准予取保释放，邱即照令办理，在未离开贵阳前，邱个人到黔特会说明情况，因无车辆便由邱押送受训人员，徒步去渝。收容所即告结束。

（3）第三阶段 贵州省自行设立收容所

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训导团将收容所撤销后，至四六年黔特会因无关押人犯之处所，对审理工作，颇受影响，当时黔特会主席由省政府主席杨森兼任，杨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决定召开机密小组会议，因为原来会报参加的人多，杨恐泄漏机密，乃另成立机密小组会，由六个主要单位负责人出席，出席这个会议的有：省政府主席杨森，省府秘书长李寰，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马守援，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周伯敏，省中统室主任冉龙沧，军统黔站站长刘秋影等。会后据刘秋影告诉我，这次会上对冉龙沧请黔特会自行设立收容所，以便被捕人员有所关押，以利审理。会议决定，从速成立收容所，仍沿用战时青年训导团贵州省收容所名称，所仍设所长一人，下设总务、训导两个组，每组设组长一人，事务员一人，经费，因粮，由省政府令财政厅、田赋粮食管理处按月拨给，所址设在育

嬰路孝子祠原贵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贵阳警备部看守所已迁别处），并决定省中统室李天晨为所长，同时由省保安司令部委李为上校视察，李到收容所后，省中统室和军统黔站，将省特会审讯组寄押的人员均送贵州收容所接收关押，这时收容所虽设训导组，实际上训导工作点滴未做，成为特务关人的看守所。

李天晨任职不到半年，即调黔特会，中统室便派该室行动队长方捷三梯替。方干了半年，中统室又将其调回，另派冯世五接任。冯个性贪婪，难免不发生事故。一九四七年秋，中统室仅根据同案犯供认贵阳大十字和成银行经理李某是共党地下组织的会计，不加调查，即将李某密捕送收容所关押，所长冯世五接受了贿赂，另辟室（备有床铺）供李某单独居住，事隔两日，李乘深夜看守松懈时，竟自缢而死，这一事件发生后，由黔特会派员会同中统室主任向贤书、军统上校组长李桐仁到该所实地查勘，看到了李在自缢之前，撕了一块被头的白布，咬破手指，以血写了“我非共党，一死以明心迹”这十个字，李死后，未通知其家属，便由收容所埋葬了之，以致沉冤莫白！

军统与中统一直矛盾很深，军统黔站站长周养浩，乘收容所发生李某自杀事故机会，在杨森处对中统室大肆攻击，引起杨对中统不满，省中统室主任向贤书，在事实面前，无词可辩，祇有叫冯世五书面请罪辞职，经杨森批准后，中统室将所有派在收容所的人员全部撤回，让军统方面全部接收，这一为题，始告结束。

军统自接收收容所后，并无变革，仍是特务关人的看守所，他们不称所长易其名曰大队长，军统黔站派张敏夫担任。军统掌握收容所不到两年，其关押人数比冯世五任内还多，内

中受害受冤者，不胜枚举，特务害人，诚令人发指！

由于蒋介石在军事上节节溃败，解放大军正如疾风之扫落叶，眼见贵阳难保，省中统室主任刘苏屏，为处理关在收容所一批人犯，首先签请省政府主席兼黔特会主席谷正伦，以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公开名义，布告枪决李思齐等十人，及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旬，贵阳解放前夕，省中统室主任刘苏屏，军统黔站站长何锦书，签呈谷正伦主席，以贵阳危在旦夕，关在收容所人犯之处理，刻不容缓，对情节轻微，祇是嫌疑者，拟准取保释放，其情节重大，确系地下党员，则予秘密处决，经谷正伦批准后，闻于十一月十二日夜晩，中统在贵阳郊外沙河，军统在贵阳城外东山，秘密处决了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聂汝达、王永年等共约二十人。收容所全部被关人员处理完毕后，中统室和军统黔站全部特务人员才撤离贵阳。

这篇史料，系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惟事隔三十余年，难免遗漏和错误，尚希知情者有所补充和指正。

一九八一年十月

我参加东北反人民战争的回忆

许 义 濬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要想长期统治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对外进一步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出卖主权。对内则排斥异己，荼毒人民，积极发动内战。我当时任国民党军卢汉部第93军暂编18师师长，也被调到东北参加了这场反人民的战争，为时五个月，现将亲身经历，回忆如次：

(一)

当日本帝国主义刚刚一投降，蒋介石即电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将暂编24师留驻云南，其余第60、93两军及暂编19师和暂编第23师归第一方面军指挥，由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领进入越南受降。我当时任第93军暂编第18师师长。在第一方面军所率各部队进入越南不久，蒋介石即于10月3日密令他的嫡系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以武力解决龙云，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另派卢汉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汉未到职以前，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这件事情发生后，第一方面军的官兵，由于长期受到龙云培育，又多是云南人，对此都非常愤慨。咸以为蒋介石是一国元首，人事调动，应该以明令行之，如果龙云不服从命令，再用武力解决，还可以说得过去，不采取正常步骤，而出之以武力袭击，这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这一事变的发生，很明显的看出

蒋介石在调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时，即已预伏着这个阴谋了。

我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经过了八年的艰苦抗战，急需休养生息，以治好战争所遭受的创痛，进行和平建设，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和强烈的愿望，就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兵，尤其是士兵，大家都希望复员回乡，一家团聚，过太平日子。但是蒋介石却恰恰与此相反，他为了继续维持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却不顾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顽固的与人民为敌。他一方面不择手段排斥异己，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当蒋介石以武力解决龙云，劫持龙云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长以后，入越受降之第一方面军，受降任务告一段落，于1945年10月底，蒋介石即电令卢汉，将所属部队整编为60、93两个军，准备调去东北归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指挥，妄图消灭东北的共军。当时国共双方，已签订“双十协定”。蒋介石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就说明了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而是骗局。因为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还不够，部队大部还在西南，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借和谈来欺骗人民，一方面借和谈为烟幕，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

在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接获将所属部队整编为60、93两个军调赴东北的消息传出时，大多数人都很惊异，认为我们是云南的部队，官兵都是云南人，怎么会调到远在万里以外的东北。卢濬泉军长就约着我到方面军司令部去见卢汉，探听这个消息是否确实。卢濬泉是卢汉的么叔，我们去时没有经人通报就直接到卢汉的办公室。当卢濬泉问到这个消息时，卢汉说：“我也在怀疑是否电令弄错了，现在我已去电询问”。这时已是午饭时间，卢汉留我们两人吃饭。在吃饭间，卢汉笑着向我们说：

“要是真的调你们去东北，你们这些官兵将来要在东北做一世

祖了”。过了几天，整编部队调东北的命令正式发表了。我当时存在着贪生怕死的思想，感到我当了几十年的军人，要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是为国家，为民族，是光荣的。要是在内战中送了老命，不值得。因此在卢汉召集各军师长的整编会议上，我就要求辞职，准我编余。卢汉说：“现在整编，不论编后是何人负责，现在仍由原任军师长按照整编方案认真负责进行。编好了要是自己继任也好带，就是别人接替，也要编好清清楚楚的交代，才是负责的态度”。我即不再吭声。这次整编完毕，发表军师长人选如下：

第六十军 军长曾泽生

一八二师 师长白肇学

一八四师 师长潘朔端

暂编21师 师长陇耀

第九十三军 军长卢溶泉

暂编十八师 师长许义谔

暂编二十师 师长李韵涛

暂编二十二师 师长龙泽汇

我请求编余未准，仍继任暂18师师长，在反动军队的训条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虽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也只好服从。不久，蒋介石由重庆来电，令两军军师长分别到重庆去见他，两个军长去了回来后，我们各师师长也接着一同乘飞机到重庆。在召见中，蒋介石对我们表示很信任，他说：“这次派到东北的部队是八个军，都是美式装备，而且是最精锐的部队”。蒋介石还讲了东北的重要性，大意是说：“东北是我国的国防要地，又是工业基地，资源丰富。没有东北，就没有国家，我们必须把东北的共匪肃清，你们到东北就要担负这一重大任务”。他还指示，“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同俞济时局长

接头”(俞济时为蒋亲信，当时任军务局局长)。谈话后蒋介石还用他和宋美龄的名义柬请我们吃饭。这次蒋介石召见我们的时间，大约是在1946年1月底，是在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下达停战令以后。由此又可以证明蒋介石对和谈、对协定，根本就没有诚意。他在和谈中以及双方达成协议以后，始终坚持发动反革命内战。

我们在重庆期间，有一晚上，龙云派他的秘书约我们几个师长到他家里去坐。见面后，龙云即大骂蒋介石说：“蒋介石集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集权独裁暴君，是一个阴险狠毒，嫉妒成性的奸雄，是一个卑鄙毒辣的市井流氓……”他越骂越愤怒。接着他又大骂卢汉说：“卢汉这个娃儿，自小就跟着我，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不听我的话，出卖我，这个娃儿没良心！”等等。骂后又继续说：“听说蒋介石要调你们去东北打内战，抗战八年，国家需要和平安定，从事建设复兴，你们千万不要去，不要把云南的子弟葬送在东北，为这个独裁暴君当炮灰。你们应该把部队拖回云南去”。我们当时认为龙云因蒋介石以武力解决他，由于他的积怨而发泄，他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骂卢汉，是否因蒋介石以武力解决他时，卢汉在越南无表示，又接受了云南省的任命而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当时我们不好作任何回答，只好默默无言地听他谈话，他大约谈了个多钟头，我们才辞了出来。

(二)

我们由重庆转回越南后不久，蒋介石即来电，令60、93两军由越南出发，开往东北，归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指挥，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回云南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60军在海防集中后，即乘美国舰艇运东北。93军由越南出

发取道广西经南宁、梧州到达广州集中后，乘广九铁路火车到九龙，由美国舰艇运东北。1946年2月底，93军由越南出发时，我奉命率暂编18师为先头部队，即由河内乘火车到同登，由同登徒步行军，经睦南关——凭祥——临明——明江——南宁——宾阳——贵县到达梧州，改乘拖轮经西江到达广州。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段行军期间，官兵沿途逃跑的很多，虽经采取许多严防措施，均无法阻止。到达广州后统计，全师官兵逃跑者几达十分之一（官长多系下级军官）。这种情况，不仅暂18师发生，其他各师亦同样发生，60军虽是在海防船运，但官兵们一得到开东北打内战的消息，即相率成批的由越南逃跑回云南。这也说明了当时一般官兵都不愿到东北打内战，为蒋介石卖命。

我在行军中曾想过一个问题：60、93两军，既同属一个集团军的序列，又同由越南开往东北，为什么不让两军即由海防船运，而让93军长途跋涉，转往九龙船运，以致官兵逃逸，防不胜防，并且两广气候炎热，长途跋涉疲劳兵力。而赵公武的52军与60军不属一个序列，反而继60军由海防上船，使我百思莫解。后来我才明白这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当蒋介石解决龙云时，怕卢汉在越南有异动，就拿云南省主席这个蜜指头让卢汉含着，同时还派了何应钦到越南代表他慰问卢汉，表示对卢汉的信任倚重，以安其心。而把用武力解决龙云的责任推到杜聿明身上，现在又把卢汉统率的云南队伍远调东北，让卢汉赤手空拳的回云南当主席，再以他的嫡系关麟徵为云南警备总司令率兵镇守，监视卢汉，使卢汉成为一个傀儡主席。而对60、93两军在调东北途中还不放心，所以才使分开行动，各在一方。60军在海防上船，赵公武的52军亦同时在海防集结，跟着60军由海防上船，这完全是对60军的监视。93军在转往广州途中，